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点

——重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李文强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是邓小平1984年6月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选择“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在文中，邓小平首次把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内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统一起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遵循从低级社会形态到高级社会形态的规律，具体到单个国家和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从1840年开始，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失去了比较优势。面对落后挨打的局面，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近代史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国数个阶级力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尝试了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内的多种方案，但这些方案无一例外都失败了。面对那种认为中国当时走资本主义是否能站起来的疑问，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历

史不是没有给资本主义机会，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机遇，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让中国站起来。回顾历史，邓小平说，“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实践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具体形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经从空想到科学再到实践的过程，社会主义成为实践以后是不是就一成不变了呢？历史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进入实践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的。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不同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会产生具有不同特色的具体形态。“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对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形态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也在发展变化，那种长期保持某种模式不变的社会主义最终因为模式僵化而失败。

从生产力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优势，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描述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特征为依据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这就改变了过去人们以社会主义特征为依据去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树立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观点。虽然这时候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还没有形成，但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层面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元素已经显现。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从消除贫富分化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分配原则上。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在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在这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从否定造成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分配制度开始的。“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

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分配制度上首先要排除那种造成“百分之几”富裕与“百分之九十几”不富裕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其次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也不是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方式，而是按劳分配，最终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的真理性认识深刻蕴含着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共同富裕的思想。

从邓小平1980年5月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到1992年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概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入。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在这期间的1984年，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科学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什么等历史性问题，这对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起到很大作用。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既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重读经典

立德·传道·治世

——《群书治要》中的治学之道

□ 喻新捷



《群书治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宝典。它是唐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及萧德言等人，于贞观五年编辑成书。该书以“务乎政术，存乎劝诫”为宗旨，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自14000多部、89000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裁淫放”，撮取65种，计50余万言，涵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杂家等思想流派内容，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说：“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群书治要》不仅辑录了经史百家中有关中国古代治国安邦、匡政利民的治道思想，同时也撷取了有关治学的精彩论述，从中我们得以探究中国古人的治学之道。

“夫学，身之砺砥也”：治学首先立足于对自身德行的磨砺

《群书治要·尸子·劝学》中记载：“夫昆吾之金，而铢父之锡，使于越之工铸之以以为剑，而勿加砥砺，则以刺不入，以击不断，磨之砺砢，加之以黄砥，则其刺也无前，其击也无

下，自是观之，砺之与弗砺，其相去远矣。今人皆知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砺砥也。”即使是昆吾的铜、铢父的锡，越国的良工将它铸造成剑而不加以磨砺，用它刺击不能深入，侧击也不能砍断，但如果用磨石加以磨砺，那么无论用它来刺击还是侧击，都将锋利无比，磨砺与否，相距甚远。以磨砺譬学，可见，学习就是对自身的磨砺。这种对于自身的磨砺正是源自古人对“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材，不生而能”的体悟。

《群书治要·潜夫论》对此有深刻的阐释，“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圣人成就德行道义的是智慧，用来取得聪明智慧的就是学习。“黄帝师风后，颡顼师老彭，帝尧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由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黄帝、颡顼、帝尧、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11位君子都是极负盛名之人，他们尚且要通过学习才能智慧渊博德行伟大，更何况是平常人呢？

君子通过“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幽赞之以周易，

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济乎”以成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正如英国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论读书》中所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通过学习磨砺自身涵养德行。

“君子学以致其道”：治学关键致力于对经典道义传承

《群书治要·汉书二·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古代读书人除了耕种和读书之外，心无旁骛，学而思，思而行，从有志于学到通达五经，扎下学问的基础及人生的根基。正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读书不能浅尝辄止、食多求快，而应反复推敲、琢磨其义。通过精读原典，真正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深谙经典中所承载的亘古不变之道。正如《群书治要·汉书二·志》中所言：“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

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为我们道出了孔子如何在治学的过程中阐释圣人经典。《论语·述而》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老彭。’”皇侃《论语义疏》阐释：“述者，传于旧章也。”孔子在周王朝衰微，分封制瓦解，礼崩乐坏的时代下，为了维护周礼和王道，对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文献典藏进行梳理，整理出我们现在所知的“六经”，期待以先王之道来平当世之乱，从而成就了太史公所谓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将言史视为“述”，“成一家之言”当作“作”，那么孔子“述而不作”的治学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文人在领悟古圣先贤哲思的基础上进行著述，就算久远的经典文献在浩瀚史海中丢失，也可在后世文人的著述作品中闪耀思想光芒。《群书治要》共选录了60多部经典，其中《尸子》《申子》《傅子》《典论》《体论》《典语》《昌言》《政要论》《时务论》《袁子正书》《桓子新论》《崔寔政论》《刘虞政论》《蒋子万机论》等14部在唐代以后即已散佚，后世学者正是凭借《群书治要》才完成以上文献的辑佚，这在体现《群书治要》独特文献价值的同时，充分展现了治学过程中通过“述而不作”而成就经典道义的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一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亲自策划发动、亲自领导督战脱贫攻坚战，对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这些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创新性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确立了基本原则、基本方略和实现方法路径，破解了诸多反贫困道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难题，成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科学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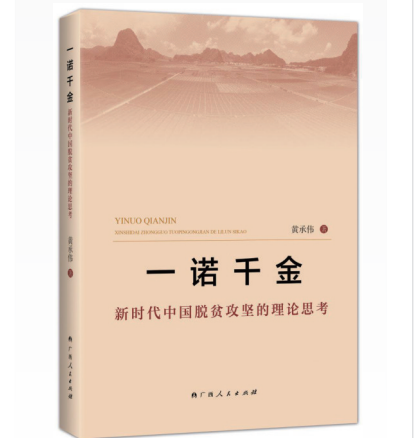
在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11月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标志着“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完成。脱贫攻坚的成败在于能否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其中最关键的又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是否能够全面、系统、准确理解习近平扶贫论述，并用以武装头脑、推动实践、指导工作。因此，系统阐述习近平扶贫论述与减贫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既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脱贫攻坚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向国际社会宣传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基础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此，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研究员，将近年学习研究习近平扶贫论述的论文，汇编成为《一诺千金——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思考》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以习近平扶贫论述为遵循，系统分析脱贫攻坚的战略政策体系、机制创新等顶层设计与习近平总书记每一个方面的扶贫重要论述的内在关联性，这对于读者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论述，准确理解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政策措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理论思考

□ 储峰



书海泛舟

妇、兄弟姊妹、朋友，这五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天下共同遵守的伦常大道。而智慧、仁爱、勇气这三者，是人间最美好的德行，实行这些伦常大道和美好德行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体现出“道”和“德”紧密相连。“道”被看作是宇宙间实存的天地之道，表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将顺乎自然法则的“道”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有了“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的人伦日用之“德”。“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通过治学，实现“德”与“道”配，将客观普遍的天道转化为现实社会的个体之德。

《群书治要》以历代“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和“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作为选材之依据，以儒经为基础，引史实为证，广纳众家之善言，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治学宝典。时至今日，其编撰体例及书中关于治学的深刻论述对我们今人读书、做学问仍极具借鉴意义。通过《群书治要》所展现的古人治学之道，让我们明白：学者唯有磨砺自身意志、德行，才能抓住学问之根本、立乎其大者；唯有研读经典，才能学习、领会古圣先贤治世治学的生命智慧；唯有秉持古圣先贤治世治学的生命智慧，才能使学进、使德修、使家齐、使国治。诚如是，方能避免“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创作出利国益民的经典作品。前贤有言曰：“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此之谓也。

治学之道